南下的中国革命作家与新马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

——以洪灵菲、许杰、马宁为例

肖　怿
(南华大学 教务处,湖南 衡阳 421000)

[摘　要]　文章集中探讨 1927—1931 年先后流亡南洋的三位中国革命作家洪灵菲、许杰、马宁在文艺理论、文化和社会活动方面对南洋社会和新马华文文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影响的交互性。这对我们了解战前该时期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脉络有指示作用,同时具体到这三位作家,对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疆拓境"的一面应有更准确的定位。

[关键词]　洪灵菲;　许杰;　马宁;　新马华文文学;　影响;　交互性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755(2014)05 - 0113 - 05

新马华文文学的发生和早期发展,不仅建立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上,更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新马华文文学的启悟、激发和推动,甚至许多新马华文文学的早期拓荒者,都是在各种背景下因各种原因南下的中国现代作家,将在国内接受的新文学影响,直接带到南洋而出现的。反过来说,这些早期南下的中国作家,其在南洋的生活、工作经历及文学艺术方面的活动也构成他们整个文学生涯的一环。洪灵菲、许杰、马宁,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谈不上属于一流作家的行列,但他们在 1927—1931 年先后流亡南洋,有着相似的南下背景和原因。他们在流亡南洋期间对当地社会和文坛所做出的贡献以及所产生的影响都足以使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放"异彩"。严格来说,"过高地评估他们在当地所起的作用是不对的,但过低地评估或抹煞他们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有欠公允的"[1]。因此,通过对南下的三位中国革命作家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影响及其影响的交互性分析,不难发现新马华文文学在受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同时,多元文化的海外环境也在影响和改造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

一　洪灵菲、许杰、马宁南下前后主要文学经历

根据现有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如果从 1923 年聂甘弩南下吉隆坡算起,先后在南洋从事过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中国现代作家就有数十人之多,其中就包括 1927 年南下的洪灵菲,1928 年南下的许杰与 1931 年南下的马宁。20 世纪 20 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社会,可以用"多事之秋"来形容。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 1927 年蒋介石发起的"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横遭摧折,无数志士仁人饮弹刑场。中国政治空气的恶化,驱使不少革命作家出走南洋。洪灵菲、许杰与马宁都是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驱迫而逃亡南洋,倘若局势不是那么严峻,他们断不会远道流亡。可见,他们的南下则有着相似的背景和原因。

其次,他们都主张"革命文学"并于南下前或北归后积极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洪灵菲在北归后的 1930 年写了一个具有纯意识形态的小说理论框架——《普罗列塔利亚小说论》,这部小说论的发表可以说对早期普罗小说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小说《流亡》(1928 年 4 月 15 日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发表,由于在国内各大城市和南洋一带销路很好,使得洪灵菲在文坛上小有名气,更因为这部作品而被誉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左联"成立初期被推选为"左联"七位常务委员之一。许杰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左联",但从他的文学主张、作品的发表以及作品所表露的思想内核来看,则是完全和左翼的同志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并且他在吉隆坡以《益群日报》的文艺副刊《枯岛》为阵地积极倡导"新兴文艺"运动期间,明确宣布要以《枯岛》为"马来半岛革命的文艺青年的大本营"。马宁在南来前便拥护"革命文学"的观点并由钱杏邨介绍加入了"左联",南下后曾担任马共

[收稿日期]　2014 - 04 - 30
[作者简介]　肖怿(1979 -),女,湖南邵阳人,南华大学教务处讲师。

中央宣传委员、马来亚普罗艺术联盟主席、马来亚反帝大同盟宣传部长。不仅主编了《南洋文艺》,积极倡导“南洋新兴戏剧运动”,还创作了以南洋为背景的 7 个剧本,被誉为“南洋新兴戏剧运动的主将”。

再次,他们都是新文学在新马推进的生力军,并创作了以新马为题材和背景的文学作品,反映当时新马的社会现实。他们南下之时正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风起云涌之际,受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冲击,他们号召新马华文作家们迅速行动起来,以革命的“手术”催生出“大众的宁馨儿”——南洋的普罗文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仅有理论上的号召作用,更是身体力行地创作了大量以新马社会为背景的谴责殖民统治和资本家压迫、反映下层人民心声、主张同情和反抗的文学作品。如洪灵菲的小说《流亡》、许杰的散文集《椰子与榴莲》,以及马宁的戏剧《绿林中》、《夫归》、《女招待的悲哀》等。

可见,南下的这三位中国革命作家其文化素养、文学准备均是在中国时俱已形成,但是作为文化载体的人是始终流动着的,当他们南渡后,他们以其地位与职业与活动范围为便利,对当地的文学艺术、社会思想等各方面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这些影响又可从他们在当地从事的一些社会活动与文化活动中具体可见:或者创办、主编文艺刊物,介绍中国进步文学思想;或者参与当地的文艺问题论争,提倡和鼓吹进步的文学主张;或者从事相关创作,通过作品来启迪和鼓舞当地的文坛,并通过反映祖国的社会动态来宣传反帝爱国思想,表现对华侨社会的关爱。基于这些活动的开展,他们把中国现代文学“二三十年代文艺”中进步的文艺观念、文学思想、文学创作乃至某些“文学以外”的东西传播并融汇于新马文坛。

二 在文学思潮与文艺理论方面的影响

(一)倡导“新兴文学”思潮,指示文艺创作方向

1927—1930 年间新马文坛掀起的“新兴文学”运动不仅以其鲜明的理论主张和丰硕的创作成果,赢得了新马华文文学的首次繁盛,同时也为后来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马救亡文学、1945 年后的新马爱国主义大众文学的鼎盛,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大量史料证明,作为新马华文文学运动主流的“新兴文学”运动是在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的震荡下兴起的,其中为该运动起推波助澜作用的中国革命作家许杰,因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前瞻性认识,从创办文艺副刊《枯岛》伊始,便在新马文坛积极提倡具有新兴意识的文学,为当时的新马作家探索新马华文文学发展指出了一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路向。诚如许杰在《枯岛》的发刊辞中明确表示:“人间是一座枯岛,我们必须用文艺的锄头去开垦它。人类的心田中滋长着的是一丛荒草,我们要用科学的锄头去铲除它。”[2] 许杰在《枯岛》上所发表的对于新兴文学的认识与理解已达到对其具体内容方方面面而又系统有序的探讨阶段,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许杰连同他的《枯岛》,才造就了新马华文文学运动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此后,具有新兴意识文学的刊物在他的引领下更是风起云涌,至 1930 年底,先后发刊 20 余种[3]。

客观来说,在新马所倡导的这场新兴意识的文学,它虽未产生一些声名显赫的文学巨匠,也未产生多么不同凡响的文艺作品,但是“它毕竟突破了旧文学怡情遣兴的狭小樊篱,将个人命运纳入了改造整个社会的洪流之中”[4]69。新马早期南下的中国作家们所倡导的革命文学思潮,尽管由于社会政治条件的制约而无法成绩显著,“但它毕竟撒播了自由、平等民主与科学的种子,从而为后来新马人民摆脱英联邦解放和民族独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4]69

(二)秉承现实主义理论,使之成为新马华文文学的主流

渊源于中国“五四”新文学的新马华文文学,从一开始就倾向于“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据李志《从“移民文学”到“本土文学”—从南洋华文新文学的诞生、发展看海外华文文学的承继关系》一文透露,1918 年 8 月 16 日《益群报》创刊的《新小说会》,在该报接连发表的 39 部连载的白话新小说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均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5]。直至 20 世纪 20 年代末,包括洪灵菲、许杰、马宁等南下作家把中国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介绍到新马文坛,在当地或倡导或践行新兴文学运动,使之成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马主流文学思潮,也从此奠定了新马华文文学其后风行四五十年的现实主义路线。南洋色彩的文学、抗战文学、爱国主义文学等主张,其实质走的还是反映现实的路线。只有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受欧美和港台影响的新马现代主义文学崛起,新马华文文学系统才有足以与现实主义相抗衡的文学思潮。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 20 世纪二三十代的革命文学经过南下作家传播与中国进步文艺书刊的输入左右了新马华文文学运动方向近 30 年。

流亡南洋的许杰和马宁无论从理论倡导、问题

论争还是文学创作都是现实主义理论的践行者,至于洪灵菲,其本身就是普罗小说的热心提倡者。洪灵菲虽逗留南洋的时间相对短暂,也未直接参与当地的文化活动,但从其回国后撰写的第一部以南洋生活为背景的作品《流亡》在南洋的热销(1928 年 4 月初版,同年 9 月二版,1933 年 2 月达五版),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其作品对南洋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洪灵菲写的《流亡》,虽带有革命浪漫主义的气质,但旨归是要通过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揭露社会现实黑暗,指引广大的人们走向新的生活,诚如他所说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是普罗列塔利亚解放运动中的工作的一部分,他歌咏着自身阶级的英勇的斗争,唤醒自身阶级里面的大众。他暴露敌对阶级的罪恶,表扬自身阶级的伟大的精神。”[6]这种鲜明的文学立场激发了与中国政局、时局紧密相联的新马文坛,从而使新马华文文学干预现实的意向更为明确。

综观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40 年代末的新马文坛,“马华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一开始就是现实主义的,尽管几十年来新马华文文学运动有时高潮,有时低沉,但现实主义的精神,却始终贯串着战前新马的文学史,体现在所有重要的作品里,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流,从未间断过。”[7]

(三)推进具有南洋本土文化意识的文学观

新马华文文学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诞生后,至 30 年代初遇到挫折而走向低潮,它一方面始终保持与中国母体文化的紧密联系,中国现代文学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战文艺,都可以在新马华文文学作品一一找出“对应关系”,以致有人认为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的新马华文文学只是华侨文学而已。但另一方面,到 20 年代后半期,马华文坛就开始萌生具有南洋色彩的文学观。几乎与此同时,新马华文文学在文本创作上也开始以地方为创作时空的依归,呈现出浓厚的本土色彩。

新马华文文学从最初的对中国文学的过分依赖到提出建设具有南洋本土文化意识的文学,是源于一些从中国南下的作家因侨居新马日久,在面对当地的社会生活、社会环境及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时,促使他们认识到在认同中国文学步伐的同时,他们所面对的毕竟已不是国内的社会和读者;所反映的虽然多为国内的社会动荡或华族社会的生活,但毕竟已是国土之外的“中国文学”。对于这种观念的最初表达可以追溯到 1927 年《新国民日报》副刊《荒岛》的编辑朱法雨、张金燕、邓励诚等人,是他们有感于新马华文文学同中国文学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从而提出了“把南洋色彩放进文艺里去”的口号,他们是马华文坛上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最先觉醒的一群,这是本土文学观向侨民文学观发起的首次冲击。与此同时,1928 年 7 月为躲避白色恐怖而远赴南洋的许杰,虽然是刚到马来亚,但是很快就了解到在新马提倡南洋色彩文艺的重要性。因此,《荒岛》同仁所提到的文艺观念,立马就获得他的赞同与支持。他便借重担任华侨报纸《益群日报》主编的机会因势利导,在大力提倡新兴文学的同时,极力倡导新马华文文学的独立性,主张新马华文文学要寻找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在第 10 期《枯岛》的编后语《尾巴的尾巴》中明确表示,“……南洋有南洋的历史、风俗、人情、风景,作者不要如何穷搜远处,是俯拾即是的东西”,“文学是要有地方色彩,……如果作者能够把这种地方色彩捉住,表现在文艺里,那便是绝好的文艺了”[8]。这种理论的倡导与马华文坛已展开的要创建具有南洋本土文化意识的探求是相吻合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种文学观念在马华文坛的推广。虽然说许杰在马来亚只呆了一年半不到的时间,但他对马华文艺所起的巨大驱动作用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除了理论上的积极倡导外,新马早期的华文作家在创作上也开始奋力挣脱中国文学题材的羁绊,积极投身南洋社会生活,捕捉新马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中的各种题材,创作出大量富有南洋文艺色彩的作品。这其中包括 1931 年南下的革命作家马宁的文艺创作,他在积极提倡“南洋新兴戏剧运动”的同时,还创作出 7 部适合于南洋演出的剧本,且题材都是反映不景气环境下的马来亚人民的现实生活,他的剧本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南洋地方色彩,可说是当时新、马剧坛上可喜的收获。

现在回过来看,当时提倡要把南洋色彩融入当地文艺创作中去,在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确实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因为它不仅为日后的“马来亚地方作家问题”论争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预示着新马华文文学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对自身定位有了愈加清醒的认识与判断,其独立、自主、创新的意识也将不断得以增强与迸发。

三　在文化与社会活动方面的影响

新马华文文学从诞生之初就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有着某种血缘般的历史关系,除了地缘上接近、交通上的便利之外,还和一批中国的文化人以过客、移民或侨民的身份不断南下新马有关。其中有聂绀

弩、杨骚、洪灵菲、老舍、许杰、艾芜、马宁、郁达夫、胡愈之等,他们既是著名的作家,又是文化的使者,他们的文化与社会活动促进了中、马两地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当然也就在有形和无形之中密切和加深了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血缘关系。

而起这种沟通作用最明显的莫过于一些作家作品的影响。如前面提到的洪灵菲的小说《流亡》,其背景写的是 1927 年广州"四·一五"后的革命转折形势。小说一部分因其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风貌、时代跳动的脉搏而成为侨居新马的华人透视中国社会的一扇窗口,而小说的另一部分(第 17 节到 25 节)则因其描写了主人公、革命者沈之菲流亡在新加坡与暹罗的生活也反过来扩展了中国读者的视域。而作家许杰因为直接参与了当地的文化工作,所以从这方面的影响来说则更为明显。流亡南洋期间他不仅创作了几部以南洋社会为背景的文艺作品,还积极在新马从事文艺推广工作。这首先表现在,许杰发掘了不少爱好文艺的当地青年,对他们的投稿,许杰都悉心加以指导,其中有激励和鼓舞,但也不乏批评与指正。其次,他在担任《益群日报》的编辑时所写的大量文艺短论,系统有序地介绍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主张,并以文艺副刊《枯岛》为阵地,积极倡导"新兴文艺"运动,明确表示要以《枯岛》为"马来半岛革命的文艺青年的大本营"。可以说,许杰是"第一位在新马创办文艺刊物,从事文学活动,并产生过极大影响的中国作家",也是"在新马宣传新兴文学理论的第一位中国作家"[9]。事实上,不遗余力地为沟通国内与新马文艺界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而做了许多工作的还有本文所探讨的另一个作家—马宁。马宁于 1932 年在赤道上的南洋给当时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的丁玲寄来一篇通讯,题名为《英属马来亚的艺术界》,这篇通讯刊登在《北斗》的最后一期(1932 年 7 月 20 日第 2 卷第 3、4 期的合刊上)。在这篇通讯里他向国内文坛详尽地介绍了马来亚的文艺界状况,"以支持当时新马文艺界及其左翼文艺运动。"[10]另外,他还为当地的作品做积极推广工作,为此他编选了一本《南洋创作选集》第 1 集《被榨取者的音响》(共 10 余篇),希望"中国文坛上的新作家和批评家注意及之"。现在回过头再来看这篇通讯,至少可以说明两个事实,一方面即革命作家马宁虽然身处逆境却仍然在为新马文艺界奔走呼告,积极做着文化推广工作,认为那些马来亚华侨文坛的作品"不仅应该介绍到中国文坛"去,并且还应该"介绍到国际文坛"去;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出丁玲作为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也是十分热心地关注与中国文坛有密切关系的马来亚文艺界及其左翼文艺运动,为国内广大文艺工作者熟识马来亚当时的文艺状况作一引介工作。不难看出,这篇通讯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当时中国与新华文文学在交流史上所有过的一段历史。

此外,需要稍加提及的是,这群本身具有一定成就的文学家并不单单扮演着作家的角色,同时也是一群身兼政治角色的社会运动家。像洪灵菲,观其一生,察其全人,应当说他首先是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作家。同样的,作家马宁在南洋也曾担任过马来亚反帝大同盟的宣传部长、马来亚普罗艺术联盟主席以及马共中央宣传委员等一系列的社会政治要职。可见,他们在当地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更是发挥了他们在文化、社会思想方面的影响,而对这不同层面的全盘考量,才能更准确、深刻地揭示他们的贡献和价值。

四 影响的交互性

众所周知,新马是一个多民族混居、多语种并存的地区,其中就包括华文、英文、马来语、印度语以及淡米尔语等。这来自不同语种、不同种族、不同文化文学之间的交流、影响与互动,必定会带给新马华文文学的某些变化,赋予其某些新的特征,而这种变化和新的特征一旦进入中国作家关注的视野,那么也会带给中国新文学许多新的讯息和积极影响。

大量事实表明,南洋地区的题材早已进入我国的文学作品,成为我国现代作家关注的领域之一。据钦鸿在《略谈中国大陆对马华文文学的研究》一文的介绍,"五四"以后中国大陆对马华社会以及新马华文文学的关注,首先表现在对南洋的山水名胜、自然风貌等方面的介绍,这方面的作品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发表过不少。可见,从那时开始就有部分文化人采用游记的方式来介绍南洋那一片神奇的异域风光。其次,则是不少中国作家写了许多反映南洋社会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例如,大家最熟悉的许地山的作品,在他的笔下涵盖了印度、缅甸、马亚西亚、新加坡等多国的文化、政治特征。他的《缀网劳蛛》、《命命岛》等都是以南洋为背景的优秀小说。老舍的小说《小坡的生日》描写了"我所知道的南洋",则是通过对儿童"天真"的言谈动作来表现作者自己"心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在既强调各民族自身弱点的克服与改造的同时,又寄寓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共同奋斗"的美好理想。洪灵菲的自传体小说《流亡》,则描写了作者流亡在新加坡、暹罗的生活。其中虽然

不乏辛酸和离愁之苦,但行文依然充满了对同样处于被压迫被奴役民族不幸命运的同情与怜悯。许杰的《椰子与榴莲》则不单从经济、政治的角度来展示南洋社会那“硬性”的一面,还把南洋社会那神秘的、热带的、社会的、宗教的富于“软性“的一面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刻画。另外,马宁的《南洋风雨》也同样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新奇的南洋社会,那里不单有旖旎的自然风光、华侨各界人士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情,还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胶农)痛苦不堪的生活。可以说,这些作品因其提供了许多新的描写对象、新的创作素材,从而在新的侧面满足了广大中国读者的审美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宝库,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不可缺少的名篇。此外,中国文坛对马华文坛的关注还可以表现在“发表马华作家写的作品”[11]102,以及“评论马华文文学作家及其作品”[11]103等多方面。

从上述意义出发,我们不妨可以说,新马华文文学虽然脱胎于中国“五四”新文学,在其后的发展衍化过程中也因不断吸收中国新文学的营养而不断变得成熟丰厚,但它毕竟是在中国大陆本土之外的异域民族语境和异质景观下的一个文化实体,必定会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等诸因素的差异,使新马华文文学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而正是这差异性反过来又带给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许多启示,并赋予了中国新文学史以海纳百川的性质。可以说,沐浴着热带椰风蕉雨的新马华文文学,在其发展衍化过程中和中国新文学之间一直是处于交流、渗透、影响的双向互动之中。对于将来,相信会随着联系与沟通渠道的多样化和便捷化而使得这种双向影响与互动更趋频繁,从而为构建共同的华文文学增添更多的新元素,使其在全球化的语境和文化视野下,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林万菁. 中国作家新加坡及其影响—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八年[M]. 新加坡:万里书局出版,1978:138.

[2] 杨松年. 新马早期作家研究——1927 - 1930[M]. 香港:三联书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8:56.

[3] 饶梵子. 中国文学在东南亚[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62.

[4] 邓乐群. 南洋文艺铁塔的熔铸—杨松年《新马早期作家研究》散论[J]. 衡阳师专学报,1993(3):67-72.

[5] 李 志. 从“移民文学”到“本土文学”—从南洋华文新文学的诞生、发展看海外华文文学的承继关系[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4):122-128.

[6] 洪灵菲. 普罗列塔利亚小说论,文艺讲座:第 1 册[M]. 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 214.

[7] 林文锦. 文学现实化理论的探讨—战前五年新马华文文学研究[J]. 外国文学研究,1991(2):100-105.

[8] 许 杰. 坎坷道路上的足迹(七)[J]. 柯平凭协助整理. 新文学史料,1984(3):67-78.

[9] 许 玄. 绵绵清溪水—许杰纪传[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9.

[10] 郭惠芬. 丁玲与新马文艺界[J]. 新加坡文艺,2002(88):13-17.

[11] 钦 鸿. 略谈中国大陆对马华文文学的研究[J]. 学术研究,1993(2):102-107.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the Three Chinese Revolution Writers Who went Southwards on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Taking Hong Linfei, Xu Jie, Ma Lin as examples

XIAO Y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will focus on illuminating the effects of the three Chinese revolution writers who went southwards on Nanyang society in the literature conception, culture and the social activity aspect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in the 1927-1931, which not only can make u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during the period of pre-war, but also can be more accurate, more profoundly to reveal the three writers'valu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Key words: Hong Linfei; Xu Jie; Ma Lin;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influence; interactive